

# 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梳理與思考\*

## Over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net Language Studies

◎ 程潤峰、謝曉明

**提 要：**缺乏方法論上的探索與創新，是當前網絡語言研究的一個軟肋。基於此，我們在梳理國內外現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綜合借鑒其他學科知識，提出我們對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思考——抓住網絡語言背後的技術特質和媒介特性，積極引介國內外、語言學內外的各種研究方法，尤其是要樹立抽離性和浸入性的方法論意識，以避免網絡語言研究的簡單化、空洞化和同質化。

**關鍵詞：**網絡語言；語言研究；方法論

**Key words:** Internet language; language studies; 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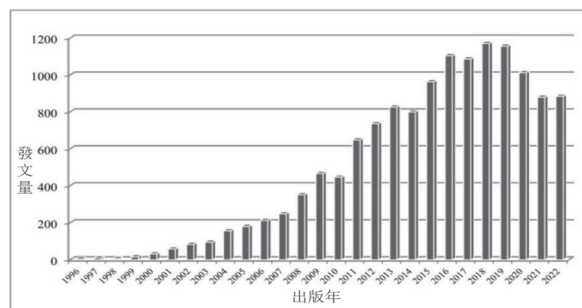
### 一、引言

伴隨移動互聯網絡的發展與普及，網絡語言在當代語言生活的比重和地位日益升高，“網絡語言研究也漸次成為學術關注的熱門領域，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汪磊，2016：43）。

利用中國知網（CNKI）的高級檢索功能，以“篇關摘 = ‘網絡語言’ 或含 ‘新媒體語言’ ”為檢索式，進行精確匹配後，我們共得到 26,577 篇中文文獻（截止到 2022 年 5 月 31 日）。再通過人工篩除電信技

術、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等方向的非相關文獻，得到網絡語言研究中文文獻 13,567 篇。對其發文分布進行計量視覺化呈現，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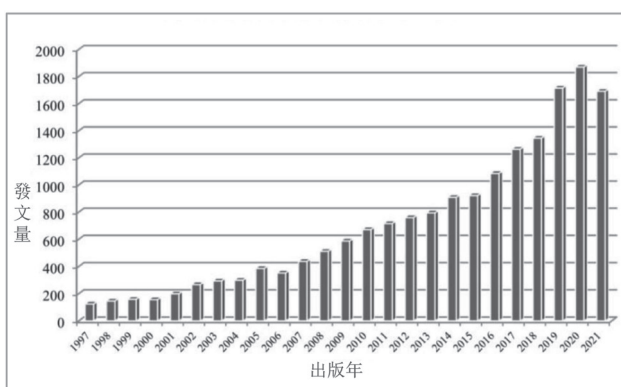
圖 1 國內網絡語言研究發文分布圖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語言與媒介互動視關下當代漢語創新演變研究(23AYY008)、華中科技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人文社會科學自主創新重大交叉項目)“新媒體語言的創新、應用與治理研究”(2022WKZDJC004)的階段性成果。

利用 Web of Science 數據庫的高級檢索功能，“TS = ‘Internet language’ OR ‘new media language’ O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為檢索式，同時限定 Linguistics、Communication、Sociology 等人文社科方向，我們共得到 17,866 篇外文文獻（時間跨度為 1997-2021 年）。對其發文分布進行計量視覺化呈現，如圖 2 所示。

圖 2 國外網絡語言研究發文分布圖



由圖 1、2 可知，<sup>[1]</sup> 國內外網絡語言研究均已進入平穩期，2016-2020 年，每年的發文量均突破 1000 篇，特別是國內網絡語言研究，雖然 2019 年之後有所回落，但是 2022 年剛過一半就達到了 2021 年整年的發文量，回升趨勢顯著。

面對蔚為大觀的網絡語言研究，有學者提出“網絡語言學（Internet Linguistics）”的構想（Crystal, 2011: 1；陳敏哲、白解紅，2012：132），認為只有構建出真正的網絡語言學，才能切實反映網絡語言的屬性特徵和網絡語言生活的演變態勢。在我們看來，網絡語言學能否成立的關鍵，就是要形成真正能夠契合網絡語言這一新事物新範式、新理論、新方法，特別是要創設出一套能夠揭示網絡語言底層邏輯和深層機制，同時便於調研線上語言生活的方法論。

然而，據我們觀察，目前網絡語言研究多陷於個別詞語的現象描寫、例證分析，或者依賴語料庫、

圖文數據庫等進行量化考察，主要移用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缺乏方法論上的探索與創新。正如楚艷芳（2016：111）所指出的那樣：“學術研究講求‘新材料’‘新方法’，網絡語言可謂一種‘新材料’，與傳統語言有着諸多不同，故而網絡語言研究也必須要有不同於傳統語言研究的‘新方法’。”基於此，我們重在探討網絡語言研究的方法論，在梳理國內外現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綜合借鑒其他學科知識，提出我們對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思考——抓住網絡語言背後的技術特質和媒介特性，積極引介國內外、語言學內外的各種研究方法，尤其是要樹立抽離性和浸入性的方法論意識，以避免網絡語言研究的簡單化、空洞化和同質化。

## 二、網絡語言研究方法的梳理

### 2.1 國內網絡語言研究方法梳理

在正式梳理之前，我們必須要作兩點聲明。第一點是梳理的目的。目前尚未有人對網絡語言研究的方法論撰以專文的概覽，而通過展示目前的方法使用現狀，既能反映當下的研究方法是否契合網絡語言的特徵，也能為我們建構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思考奠基。

第二點是梳理的方式。從 1996 年國內首次正式討論這種“新的網絡語言”<sup>[2]</sup>（楊則正，1996：51）開始，網絡語言逐漸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門選題。由於網絡語言和當代青年有着天然的親近性，網絡語言也就成為許多人學術生涯第一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當前許多期刊論文只停留在對網絡語言現象的簡單介紹上，並無明確的方法論體現。而學位論文的慣例是要寫明研究方法，有明確的方法論體現，對學位論文所用方法的統計足以反映國內網絡語言研究方法的主流面貌。同時，

對於上萬篇期刊論文，我們不可能一篇篇地去細讀以提煉其方法論。因此，為了我們梳理的便利性，我們主要對 1,143 篇相關學位論文（1,110 篇碩士學位論文，33 篇博士學位論文）中的“研究方法”進行量化統計（統計情況如表 1 所示），對這些學位論文沒有寫明的一些研究方法，我們再輔以典型的期刊論文予以說明，以彌補統計樣本類型不全的缺憾。

表 1 國內網絡語言研究方法統計（基於學位論文）

研究方法		使用頻次
定性	描寫歸納法	1037
	文獻綜述法	755
	比較分析法	410
	案例分析法	367
	參與觀察法	139
	訪談法	123
	假設演繹法	87
定量	數據統計法	331
	問卷調查法	202
	語料庫量化分析法	198
	實驗法	29
	公式計算法	7
	社會網絡分析法	3
混合	話語分析法	52

由表 1 可知，就學位論文而言，國內網絡語言研究較多地使用質化方法，較少地使用量化方法。語言學中的定性方法重在研究語詞符號本身，定量分析則重在分析語言應用情況（桂詩春，1999：5）。這說明當前我國網絡語言研究的主流範式仍是本體考察。

### 2.1.1 定性方法概述

上表前六種方法都是學界所熟知、慣用的質性研究方法，這裏僅結合相關研究，介紹一下假設演繹法。

假設演繹法即從理論假說或研究者自己擬定的假設出發，進行演繹推理。梁琦秋（2012：11）首先設定模糊性是網絡語言的顯著屬性，認為網絡語言作為自然語言的社會變體，同時受到語法規則和語用習慣的制約，形成語義和語用兩個層面的雙重模糊，進而分析網絡語言模糊性的機制、表徵和功能。

實際上，除了上述這些定性方法，還有許多期刊論文使用了一種常見的質性方法——理論框架分析法（也有不少學位論文使用了該種方法，只是沒有在文中寫明），即借助既有的理論框架來分析網絡語言生活及其現象。比如陳麗湘（2021：41）就利用 PEST 宏觀環境分析框架，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媒介四個維度解析了媒體語言治理的政策環境。

值得介紹的還有源自數學的博弈論，這是一種研究理性主體在相互作用下如何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論。語言交際也是一種競爭性行動，語言的輪回和交鋒就是一種博弈，所以博弈論也適用於網絡語言研究。比如王炎龍、朱述才（2009：26）從零和博弈的思維出發，探討了網絡語言傳播的進化觀。又如繆素琴、祝爾悅（2022：47）在演化博弈論的視角下考察了網絡語言交際策略的選擇和優化，認為網聊符號的諸多特徵是因為交際環境由線下演變為線上而語言系統發生突變所致。但是突變過程中遇到了“侵入界限”，母體語言在進化過程中呈現整體穩定的狀態。

### 2.1.2 定量方法概述

數據統計法和問卷調查法是典型的量化方法，

此處亦不贅筆。語料庫量化分析法是最具語言學特色的定量方法，主要有兩種操作模式。一種是依據已有大規模語料庫。比如王宇波（2011）依託華中師範大學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網絡媒體中心的監測語料庫，對漢語網絡語言的性別化差異進行考察。又如崔希亮（2019）依據北語 BCC 語料庫，統計分析新媒體語言各種現象，並透視它們的語言學價值、修辭學價值和社會學價值。另一種是自建小型語料庫。比如鄭婷婷（2017：6）編程爬取了政務微博意見領袖在 2016 年下半年的微博發言內容，建成微博語料庫，再利用統計軟件對語料庫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從而量化意見領袖在詞、句、篇等方面的話語特徵。

實驗法主要見於管理學或心理學視角下的網絡語言研究。王亞泉（2015：2）通過現實線上環境實驗和模擬線上環境實驗，證明網絡交際中使用非語言符號比使用單一語言符號更能激發起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這其中消費者情感的中介作用顯著，而消費者性別的調節作用並不顯著。

公式計算法即借助其他學科的公式來分析網絡語言現象。鄒春燕（2015：8）利用生態學中的生態位計算公式，統計對比了網絡流行語和傳統詞彙的平均語義生態位寬度，以確定網絡流行語生命指標的閾值。

社會網絡分析法意在用一系列統計手段來分析相互作用的社會個體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給社會網絡整體結構或者社會網絡內部個體帶來的影響。張佳奇（2021：100）借助 UCINET 軟件，對互聯網語境下各類群域交際中的人物對話關係進行社會網絡分析，將交際個體映射為一個個節點，將交際者之間的關係映射為一條條連邊，認為群域交際中有較多連接節點的交際者，度值較高，在群域交際網絡中處於優勢、核心地位，即為意見領袖。而

意見領袖會對語篇型式的結構呈現、意義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期刊論文中還有兩種量化方法也值得介紹。

第一種是指數分析法，即利用大型網絡信息平臺的搜索指數、資訊指數等，來觀察網絡語言的歷時演變情況。主流的指數包括百度指數、微信指數、清博指數、新浪微博微指數等，各指數一般涵蓋年度變化、整體（移動）日均值、整體（移動）同比、整體（移動）環比等數據。指數分析法不同於數據統計法，不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搜集、整理數據；也不同於現有的語料庫分析法，準確來說，這種量化方法就是為了彌補即時更新的歷時語料庫的缺乏。宋作艷（2019：227）應用百度指數，展示了新詞語熱度和生命力的變化，將新詞語的週期演變軌跡概括為凸起型、下降型和上升型三種，並指出由同一個詞語模產生的新詞語的指數線具有一定的平行性。

第二種是知識圖譜的視覺化分析，這是一種建立在大數據和語義網絡基礎上的研究方法。馬若宏、杜敏（2021：15）借助 CiteSpace 文獻計量視覺化軟件，繪製了近十年國內新媒體語言研究的知識圖譜，發現形成了圍繞新媒體、規範化、模因論等關鍵詞的研究規模，但仍存在研究視角分散、校際合作群較少、微觀研究多而系統研究少等不足。杜長虹（2022：61）通過知識圖譜的視覺化分析，辨析了“網絡用語”“流行語”“熱詞”“新詞語”等術語的離散化特徵。

### 2.1.3 混合方法概述

話語分析法被認為是質化、量化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其中量化（相關數據支撐）是基礎，質化（對話語架構的描寫、對話語功能的解釋、對話語實踐的批評或建構）是核心。例如劉璐（2019：32）從話語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三個維度對網絡流行語的心態表徵展開批評話語分析，探究話語表徵



心態背後的意識形態碰撞和話語權力建構。此外，學界也討論了話語分析法之於網絡語言研究的適用性。李戰子（2016：54）認為話語分析法可以為互聯網話語提供量化的分析和精微的闡釋，揭示新媒體特性和網絡話語特徵的互動塑造，進而為新媒體研究、網絡輿情分析等領域提供語言學的視角。劉文字、李珂（2017：122）指出，現階段的網絡語言暴力研究主要依照行為主義範式或者情境互動範式，前者將語言暴力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主要關注網絡語言暴力中的具體行為及其後果，顯得過於微觀化；後者則着眼於語言符號的社會功能，又常常浮於宏觀，並認為基於批評性話語分析的“事件—過程”方法論可以彌補當前研究中觀層面的不足。

## 2.2 國外網絡語言研究方法梳理

國外學界早期普遍認為網絡語言屬於“以計算機為媒介的交際（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的範疇（Baron, 1984）。所以國外網絡語言研究從一開始就運用多學科的方法，更主要地引入傳播學、信息科學的方法論來開展研究。後來，Crystal（2001: 19; 2011: 2）指出“Netspeak（網絡用語）”“Internet language（網絡語言）”作為“CMC”的同義術語，更適合用來指稱該領域的研究對象，由此開辟出網絡語言研究的語言學路向。這一路向就主要移用的是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像 González（2003: 162）在述介 Posteguillo 的《網絡語言學》（Netlinguistics）時，就認為該書“成功的關鍵因素就是採用了純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發展至今，國外網絡語言研究已然形成了與國內不同的方法論特色：定性和定量研究都較豐富，整體上偏重量化與實證研究，努力將語言學的內部方法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融會貫通（劉昌華，2022：67）。

雖然國外網絡語言研究更注重量化統計和學科

交叉，但一般情況下，其所使用的具體方法與國內研究是大同小異的。例如 Jeong（2005）綜合運用假設法、實驗法、計算模型法、數據統計法，並借助巴赫金（Bakhtin）的對話理論，以及數學與統計學中的 Z 分數（Z scores）、轉移概率矩陣（transitional probability matrix）等，提出了一套用以評估或預測 CMC 中群體交互的研究框架。首先給出網絡言語衝突必須依存於“消息—回應序列（message-response sequences）”的假設，然後對不同類型的“消息—回應”語對進行任務測試，再結合特定軟件工具來測量潛在變量（比如“消息”的功能、“回應”的延遲等）和外部變量（比如交際者的性別、個性等）對消息引發的回應言語行為序列的影響。此外，Bolander & Locher（2014: 24）在一篇對於網絡語言研究方法的綜述中也指出，目前該領域的語言學研究多習慣於話語分析和語料庫量化分析的既定思路，很少思考“Ethics（倫理）、The multimodal nature of computer-mediated data（電子數據的多模態特質）、moving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線上線下的切換）、Web corpora and annotation（網絡語料庫及其標註）”等方法論議題。

因此，我們在此不再贅述國外網絡語言研究中具體的操作路徑，而是介紹兩種國內學界很少談及的元方法論，以期在方法論的意識層面推進國內外的互動與交流。

### 2.2.1 非還原論（non-reductionism）

Dahlberg（2004）認為包括 CMC 在內的互聯網研究是一門複雜性科學，需要確立一種多決策（multi-determinate）、非還原（non-reductionist）的元方法論（meta-methodology）。而過度重視使用（工具性）、媒介（技術性）、社會（結構性）、資源（限制性）等因素中的某一個，會導致工具決定論、技術決定論、社會決定論等單一還原論，不利於對

互聯網整體認知的深入。所謂非還原，是指研究某一事物時，不分解還原該事物，對其認識既不能從其部分或較低層次事物的已有結論中推知出來，也不能從其所屬的更大整體或較高層次事物的已有結論中推知出來。因而網絡語言研究需要克服語言使用與滿足、媒介技術、社會背景之間的線性或層級性因果關係，並提高對構成互聯網特徵的多個交叉元素之間複雜相互作用的敏感性。

### 2.2.2 公眾科學 (citizen science)

Rymes & Leone (2014: 27) 提出了一種專注於網絡與新媒體的社會語言學范式——公民社會語言學 (citizen sociolinguistics)，即以公眾參與為基礎的社會語言學。公眾自發參與社會語言學調查和探索，討論並分享他們關於網絡語言與社會文化的理解，對這些理解的研究就是公民社會語言學。公民社會語言學活動包括關於新媒體語言的大型公共評選、個人年度報告，以及對流行語詞典的“草根編寫”等。這一公共性方法論相比由社會語言學家主導的傳統研究方法的優勢在於：1) 傳統方法論強調研究者事後為各類被概括出來的語言變項尋求社會意義層面的解釋，側重行為本身及其結果，結論具有延時性，而公民社會語言學強調對社會價值過程 (the process of social valuation) 的反映和再現，結論具有即時性；2) 傳統方法論難以適應新媒體交際的流動性、聯通性，而公民社會語言學本身就是一個大規模的參與式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既從學科研究的角度深化對新媒體的認識，也從知識建構的角度解決當今世界關於大規模流通的社會需求與負擔；3) 公民社會語言學不需要刻意引入各種模型、理論，不需要專門測量只有語音儀器才能識別的那些聲音，其自身就可以產生大量的語言數據，以及關於數據的數據和關於“這些關於數據的數據”的數據……在人們生成數據的同時，也在生成各種

各樣的研究問題。公民社會語言學的目標並不是要預先決定哪些問題應該被追問，而是觀察公眾被哪些問題吸引以及如何被這些問題吸引，由此反映語言形式的社會價值的動態變化過程。

可見，國內外網絡語言研究尚未在方法層面真正觸及網絡語言的內核屬性——網絡，要麼將其視為一種“流行語的集合”，從傳統語言學的路徑描寫其流行的表徵，分析其流行的動因；要麼將其看作一類處於演化過程的社會現象，借助各類量化工具與手段構建其演化的模型與過程。

## 三、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我們認為，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爭議，倒在質、量之爭，而在於這些方法是否能體現網絡語言的性質、反映網絡語言生活的特徵。對此，我們有以下三點認識（簡化為圖 3）：

1) 網絡語言是基於數字化新媒體這一關鍵性語體變量而形成的功能變體（徐默凡，2022）。網絡語言的發生媒介和主要的傳播媒介（偶爾也可移用至傳統媒體）都是新媒體，這使得網絡語言不同於傳統媒介下的功能變體。所以要抓住網絡語言區別於其他功能變體的技術特質和媒介特性。

2) 網絡語言是一面多棱鏡、一個多面體 (multi-dimensionality)。網絡語言研究沒有單一的理論方法，這正是該領域蓬勃發展的原因 (Crystal, 2011: 148)。所以要積極引介國內外、語言學內外的各種理論方法，開展跨學科研究。

3) 網絡語言是網絡語言特區突破慣常語言規律約束的集中體現（徐杰、覃業位，2015），網絡空間是一個新的表達空間。所以要具備能映射網絡空間之進出，即 Bolander & Locher (2014) 所說的 “moving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線上線下的切

換) ”的方法論意識。

### 圖 3 對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認識

網絡語言是一種基於媒介變量的功能變體——>  
需抓住網絡語言的媒介特性

網絡語言是一面多棱鏡——> 需引入多學科的理論方法

網絡語言是語言特區之特、表達空間之新的集中體現——> 需映射網絡空間之進出

接下來，我們首先闡述網絡語言的兩個重要媒介特性——視覺規定性和移動互聯性，然後在借鑒其他學科理論方法的基礎上，闡釋一組映射網絡空間之進出的方法論意識——抽離性與浸入性，由此呈現我們對網絡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思考。抽離性意味着問題思考的高度和系統性，可以避免研究的簡單化；浸入性意味着問題發現的廣度和真實性，可以避免研究的空洞化；二者結合，每個人對網絡語言的抽離性認知和浸入性體驗必不會完全相同，就可以避免研究的同質化。

#### 3.1 視覺規定性和移動互聯性

新媒體技術最核心的兩個特質就是數碼化 (digital) 和交互性 (interactive) (Lister et al., 2009: 13)。那麼據此產生的網絡語言也就衍生出規定性和互聯性兩個媒介化 (mediated) 特性。再考慮網絡界面的視覺性和網絡終端的移動性，我們將網絡語言不同於既有媒介化功能變體的特性總結如下：

1) 視覺規定性，即交流所用的字符主要呈現於視覺，且所呈現的字符形制都由內在的編碼所規定，保證了交際者識別該字符的清晰度和準確率，這使得網絡語言區別於聽覺呈現且容易受到各種語音因素而磨蝕交際效力的口語；2) 移動互聯性，即人們可以在移動設備上與他人互聯，這使得網絡語言區別於同樣是視覺呈現但不能實現即時隨地通訊的書面語。視覺規定性處理的主要是網絡語言的編碼和解碼層

面，而移動互聯性處理的則主要是網絡語言的傳播層面 (程潤峰、謝曉明，2022: 28)。

舉個例子，近年來非常有特色的一個表情符號“狗頭”，被認為已經發展成一種網絡反語標誌。其常附於句後，表示前面的內容都是反話，或者用幽默的方式表達某種反諷的含義。該表情義的建構與識解正是基於視覺圖形 (一隻表情略帶嘲諷的柴犬的頭) 的規定性 (該表情在不同的操作系統、不同型號的手機以及不同類型的社交平臺上的大小、形制、色彩基本一致)。而移動互聯性則迅速地讓此反語標誌在高頻的語用中固化為網民的心理表征或意象圖式，並發展出漢字“狗頭”或英文“doge”等替代形式，以及“手動狗頭”“狗頭保命”等相關表達。

同時，視覺規定性限制了示情手段的類型 (相對缺乏聽覺性的語調、聲調、重音、口氣等，以及依賴面對面場景的表情、體態、身勢等，還有個性化的字跡)，移動互聯性又帶來了高度的示情需求。網絡語言發展更新速率極快的內在動因，正是人們為了滿足高示情需要，而彌補網絡示情手段的不足，包括語言外示情手段的臨摹 (表情符號、滾動彈幕、動態示情詞、虛擬聊天室的多模態互動等)，和語言內示情手段的創設 (新興的嘆詞、語氣詞、語氣副詞、句式，以及標點符號的濫用和變異等)。

#### 3.2 抽離性 (dissociative) 方法論 (從實踐中來)

側重研究者身心之於網絡交際言語實踐的抽離 (dissociation)，即從實踐中來，在實踐之上提煉、概括、深化我們的認識。複雜適應系統和現象學分析是抽離性方法論的代表。

##### 3.2.1 複雜適應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除了 Dahlberg (2004) 等國外學者從非還原論



的角度考慮了網絡交際的複雜性，國內學者如汪磊（2022：9）也關注到了網絡語言系統的適應性：“線上語言也是一個自我調整系統，線上語言使用者亦有一個他適應過程，線上語言生活的分眾化與社群化實乃必然。”這都說明了複雜適應系統之於網絡語言研究的契合性。

所謂複雜適應系統的語言學理念是指，語言本質上是一個複雜的自我調整系統，由許多相互作用而各自具有複雜變化的子系統構成，這些子系統涵蓋從語音到語篇的各個層面，並隨着個體之間的動態協同適應（dynamic co-adaption）而不斷湧現（emergence）出新的語言表徵和言語行為，呈現出非線性的發展軌跡（Larsen-Freeman, 1997: 142; 2010: 47）。Hulstijn（2020: 33）認為複雜適應系統為理解語言使用、語言習得和語言演變的複雜性和適應性提供了終極（ultimate）意義上的本體論和方法論。

網絡語言系統的自我調整性是複雜且互動的，它既表現於系統在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的自行調試與修正，也表現於系統內部的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比如網絡語言中的語圖關係，就是這樣一種網絡語言系統內、外部複雜互動的自我調整結果。要想真正瞭解網絡語圖關係的建構機制，我們必須構建“符號—媒介—人（表達者、受眾和觀眾）”的互動模型，以及“語—圖”這一網絡語言內部的自組織模型。

此外，網絡語言不僅是一種語言演變，也是一種語言使用、語言習得的結果，人們對於網絡語言也有一個從接觸、認知到掌握的越來越敏感的習得過程。因此，我們也可以從複雜適應系統出發，借助各種量化工具，分析網絡語言演變、網絡語言使用、網絡語言習得三者之間和內部所呈現的互動關係，以及三者個體內（歷時）和個體間（共時）分別

具有的變異性特徵。

### 3.2.2 現象學分析（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現象學是一種關乎認識如何出場（即如何從實踐中抽離）的方法論，其出場方式為“本質直觀”，不同於辯證法的“透過現象看本質”（孫琳，2014：55）。

現象學分析用於語言現象，就是要以第一人稱視角來描述還原語言表述內在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意識總是指向某一事物）結構（趙猛，2020：237）。而揭示這種意向性結構的分析路向，就要把任何形而上的前提性假設懸置一邊，即不要預先認定這些語言現象的本質，然後運用“自由想像”這一特殊的認知動能，把外在條件（所括的內容）一個個去掉，從而將內在特質凸顯出來（沃野，1997：44-45）。

在網絡語言研究中，現象學分析可以和傳統語言學的語義特徵分析法、心理學的“歷史對比/自由聯想法”（計冬楨、陳佳璇，2018）結合起來。比如在辨析“網紅”的內涵與功用時，先不將其界定為一類人群或一個網絡流行語，而是把我們關於這個稱謂語能聯想到的所有現象描述紀錄下來，比如[女性][人][主播][著名][流行][火爆][賺錢多][博眼球][嘩眾取寵]，等等，然後再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內化詢問：如果“網紅”少了其中某個現象或條件，其還是“網紅”嗎？最後，我們會發現：對於“網紅”的認知是一個從模糊到明晰的連續統，是存在一個共時平面的臨界點的，即“網紅”少了某個或某些質素，是不能稱其為“網紅”的，那麼這些現象就構成了“網紅”在當下的意向性結構。當然，這種意向性也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我們還要考察其歷時演變情況，比如[女性][人][賺錢多]可能是過去“網紅”的內在特質，而[火爆]則是當



前“網紅”最核心、最內在、最普適的意向，不一定是女性，也不一定是人，更不一定要賺錢多，只要某一事物在一段時間內足夠火爆，就能被稱為“網紅”。

### 3.3 浸入性 (immersive) 方法論 (到實踐中去)

側重研究者身心之於網絡交際言語實踐的浸入 (immersion)，即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之中發現、檢驗、應用我們的認識。浸入性方法論的代表包括：網絡知識考古、網絡民族誌、紮根分析等。

#### 3.3.1 網絡知識考古 (Interne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網絡知識考古脫胎於知識考古學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和媒介考古學 (media archaeology)，是它們在網絡空間的方法論體現 (陳氙，2019: 168)。前者關心言語實踐的過程與變遷，後者強調媒介形式及其流變對我們感官體驗和認知經驗的形塑，尤其是近年來興起的“新媒體考古”主張用“媒介互動、記憶關聯”的非線性史觀勾連起視覺、媒體等與計算機軟件、網絡亞文化等之間的聯繫 (Parikka, 2012: 37-38)。所以網絡知識考古是一種既考慮網絡話語的建構，更考慮網絡話語得以儲存、傳播、演化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的歷時研究取向——利用截圖、收藏夾、搜索引擎、計算機運行日誌等互聯網記憶工具，沉浸式地搜集整理網民個體及相關社群的行動痕跡。就語言研究的方法論而言，網絡知識考古和傳統的語法化及詞彙化有一定的共通之處，都是用來考察語言成分的演化，只是二者在考察的視角方面有不同的倚重：傳統的語法化及詞彙化側重於書面和語音媒介、長歷時層面和語法平面；網絡知識考古則側重於網絡媒介、短歷時層面和語用平面。

比如，對於新興語氣詞“喂”，目前我們在網

上能找到的“喂”出現在語氣詞位置的最早用例，是百度貼吧的一個帖子：

帖子標題：喂！！好心人告訴我鳳城奇跡的 IP 地址好嗎，怎麼上不了鳳城主頁啊

貼主發言：好心人告訴我鳳城奇跡的 IP 地址好嗎，怎麼上不了鳳城主頁啊喂！！好心人告訴我鳳城奇跡的 IP 地址好嗎，怎麼上不了鳳城主頁啊！（奇跡吧 2003 年 12 月 6 日）

百度貼吧正式上線於 2003 年 12 月 3 日，這一原始用例的日期與之非常接近，這從時間上說明了該例的考古學意義。根據貼主所發標題和首次發言內容的比對，我們可以知道，此時的“喂”實際上並不是語氣詞，只是嘆詞“喂”和語氣詞“啊”在視覺上、在形式上粘合到了一起（這與語法化理論中的兩個成分因為句法位置接近而產生的“重新分析”有相似之處）。該貼主首次發言的內部結構是：兩句“好心人告訴我鳳城奇跡的 IP 地址好嗎，怎麼上不了鳳城主頁啊”的中間插了一個“喂！！”這反映了網絡媒介難以明確區分語句停頓的交際特性。現實語流中，口語用語音停頓區分各句，書面語用標點符號分隔各句。而網絡語言中的分句，既不依賴聽覺上的停頓標記，也不強制使用規範的標點符號，而是依靠網民自主使用的各類符號（隨意化的標點符號、空格、表情符號等），或者直接不分句，一口氣輸入整個語段。正是這種不愛分句的網絡交際習慣，促成了“啊喂”的初步粘合。早期的用例還如：

(1) 可不可以啊喂，牛，我在和你說話啊。（西祠吧 2005 年 2 月 16 日）

(2) 你真夠單純的啊喂，毛巾同學...（艾路吧 2008 年 10 月 16 日）

(3) 現在的年輕人怎麼口味那麼重說～（毆裝什麼老人啊喂？！我說吧主去宣傳一番吧～（卡

依吧 2009 年 3 月 20 日)

這些例句中的“喂”本質上都還是嘆詞，但與“啊”之間要麼用空格隔開，要麼直接不隔開，在視覺上讓人覺得是連在一起的。甚至 2010 年還專門成立了“啊喂”吧，說明這種粘合形式在百度貼吧用戶內已經有了一定的接受度。

而“啊”和“喂”的高頻緊鄰共現促發了人們把“啊餵”當作壹個整體使用的自動化，又加劇了這種粘合。後續用例如：

(4) 【劇場版第二彈什麼的】會有的吧？一定會有的吧？啊喂！（銀魂吧 2011 年 5 月 23 日）

(5) 啊喂…不用你告訴佐佐也知道吧（cos 吧 2011 年 8 月 4 日）

(6) 啊嘍！這是吾的告白貼還是餐廳貼啊喂！（塞巴斯醬吧 2011 年 10 月 5 日）

(7) 【啊喂】真心覺得“妖氣團”不如“半妖”好聽啊…（犬夜叉吧 2012 年 2 月 24 日）

(8) 節操碎了一地啊喂，快撿起來！（反亞夢吧 2012 年 4 月 3 日）

這些例句中的“啊喂”中間沒有任何符號的介入，已經完全粘合在了一起。而“啊喂”的高度粘合使得嘆詞“喂”感染上語氣詞的用法，逐漸語氣詞化。2010 年以後，貼吧也出現了“喂”和其他語氣詞的連用現象。例如：

(9) 你以為他是花魁嗎喂??（動漫吧 2010 年 7 月 4 日）

(10) 叔叔穿着大胸妹子的裙子賣什麼萌呢喂！（bjd 吧 2011 年 4 月 5 日）

(11) 記性太差幾秒忘記一件事，簡直和魚一樣了喂！（黑子的籃球吧 2013 年 3 月 5 日）

(12) 不好了喂，叔吧小團體又出來黑人了喂。大家趕快細軟跑。（大叔吧 2013 年 8 月 1 日）

後來，語氣詞“喂”也開始單用。例如：

(13) 明明放假了！我覺得跟我想的不一樣喂！

（聲控吧 2014 年 10 月 5 日）

(14) 來點經驗喂，來點經驗喂，來點經驗。（日本留學吧 2015 年 12 月 1 日）

在這一階段，新浪微博也正式上線（2009 年 8 月）。微博是一個比貼吧更加開放、流動的信息分享平臺，很多網絡新興語言現象都借由微博這一平臺迅速擴散開來。所以“喂”的語氣詞化還離不開“喂”在微博上的流行與傳播。

### 3.3.2 網絡民族誌 (online ethnography)

網絡民族誌又稱虛擬民族誌、數字民族誌等。如果說網絡考古是對已然成型的網絡語的形成進行追溯，那麼網絡民族誌就是對正在進行着的網絡實踐的同時空參與觀察。庫茲奈特（2016：71-73）指出“網絡民族誌是基於線上田野工作的參與式觀察”，並描摹了網絡民族誌研究的基本流程：“確定研究對象和調查主題——選擇網絡社區（群）——或長期或短期地參與觀察網絡社區（群），同時進行訪談、焦點小組等啟發性方法，並搜集資料——分析資料，解釋發現——撰寫調研報告”。由此可見，網絡民族誌與傳統民族誌在方法論步驟層面並無殊異，但由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網絡民族誌還是呈現出與傳統民族誌不同的方法論理念：1) 落腳於線上世界而非線下世界；2) 注重於文化過程，因為網絡空間具有去實體化、流動性等特點，所以更關注媒介文化的隱現與嬗變，而不是傳統民族誌所強調的物理社區；3) 網絡民族誌所觀察到的被研究者的行動、意義，和研究者完成網絡民族誌的過程，共同介入也共同構成了網絡文化實踐。

早在 1998 年，學界就指出民族誌可以作為解碼線上言語交際、瞭解線上語言生活的一種方法，但是線上的民族誌學者並不是悄然觀察的隱匿者，而是積極參與的實踐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

本上學習該社群的話語、交際手段，識別關鍵的概念、標籤等，並與社群成員建立信任和融洽關係，從而以“核心成員”的身份有效地滲透到社群內部（Thomsen, et al., 1998: 7-8）。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以上三點。

近年來，出現了一批以各類“網絡黑話”為分化標準的網絡語言社群如“淋語”社群、“郭語”社群等。如何深入考察他們的語言表徵、言語行為和話語傳播？亟待從網絡民族誌的方法論層面對其進行研究。

### 3.3.3 紮根分析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紮根分析最早由 Glaser & Strauss (1967: 5-12; 88-103) 提出，是一種從資料分析和實地調研中建構理論的方法論，通過三重編碼不斷比較文獻和數據，尋找反映社會事實的概念和命題，並形成實質理論。其基本研究程序為：案例選擇——資料收集與整理——開放性編碼（對原始資料進行開放的不斷比較，形成初始概念）、主軸性編碼（通過不斷比較，對範疇關係進行概念化）與選擇性編碼（通過不斷比較，對核心範疇進行概念化）——理論抽樣，即根據所要發展的理論目標來抽取樣本——構建理論模型——理論飽和度檢驗。

紮根分析的方法論和民族誌及考古學互補而又不同，一方面，前者概念化、形式化並延展了後者所得到的有限的理論成分（Pettigrew, 2000: 258）；另一方面前者倡導在實地研究之前就開展大量的文獻回顧，而後者主張在實地研究之前不應受限於特定文獻的影響。

目前，有關網絡語言的諸多社會現象，比如網絡語言演化、網絡語言傳播、網絡語言暴力、網絡輿情的生成與反轉、網絡話語的表達與接收、網絡語言社群的分化與統合等，尚缺乏具有普適性的理論分析框架。這就需要加強對網絡語言生活的紮根

研究。比如，在探討網絡語言運用對直播營銷的影響時，就可以通過案例梳理、數據爬取、深度訪談等，並借助 Nvivo 質性分析軟件，對關係範疇（主播、商家、買家、圍觀受眾等）、影響因素（話語模態及風格、主播語氣及口音、產品價格及品質、直播間呈現及體驗等）進行編碼，逐步抽象形成網絡直播營銷話語的時間序列（直播預熱—直播過程—直播回饋）、空間結構（社交媒體平臺、虛擬直播間）和內容層次（語境互動、言語互動、圖像互動、姿態互動），這就可以作為分析網絡直播營銷中語言運用的基本模型。

網絡語言有別於傳統語言的關鍵，正是在於網絡。而網絡，既是媒介，也是技術，更是空間。因為“網絡”，我們研究網絡語言，不能不考慮其“網絡性”特徵，也正因為傳統語言學的方法契合不了網絡語言這一仍在更迭演變的新生事物的媒介特性、技術特質和空間特徵，所以我們要從語言學外進行突圍，對研究方法進行跨學科的整合，從而在“抽離”與“浸入”之間窺見網絡語言這面多棱鏡的絢爛光輝。

### 註 釋：

[1] “篇關摘”包括篇名、關鍵詞和摘要。“TS（主題）”包括標題、摘要、作者關鍵詞和擴展關鍵詞。以它們為檢索項，可以盡可能多地檢索相關文獻。

[2] 之前的“網絡語言”特指“用以描述計算機網絡的形式語言或者計算機能夠識別並處理的編程語言”，楊則正（1996：51）指出當時出現了“互聯網上的專用語言，即對那些影響讀者感覺和心情的文字作出這樣或那樣的註釋的語言符號”。

### 參考文獻：

崔希亮 2019 基於語料庫的新媒體語言透視，《當代修辭學》第 5 期。



- 陳 胤 2019 時間、痕跡與網絡的考古學——對抗信息遺忘的互聯網記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0 期。
- 陳麗湘 2021 政策網絡視域下的媒體語言治理初探，《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第 6 期。
- 陳敏哲、白解紅 2012 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回顧、問題與展望，《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3 期。
- 程潤峰、謝曉明 2022 論網絡語言的社群化，《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
- 楚艷芳 2016 近二十年網絡語言研究綜觀，《浙江傳媒學院學報》第 5 期。
- 杜長虹 2022 關於“網絡用語”“流行語”“新詞語”等術語的辨析——基於詞頻分析和知識圖譜的視覺化分析，《現代語文》第 1 期。
- 桂詩春 1999 再論語言學研究方法，《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1 期。
- “華中大語推基地”公眾號 2022 《徐默凡的語言“膜”法：網絡語言如何示情？》，<https://mp.weixin.qq.com/s/xtqVfgfQ-GG1jiqHKEP6w>。
- 計冬楨、陳佳璇 2018 稱謂語的“歷史對比/自由聯想法”研究：以“小姐”為例，《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 李戰子 2016 話語分析與新媒體研究，《當代修辭學》第 4 期。
- 梁琦秋 2012 《網絡語言模糊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劉昌華 2022 國外網絡語言生活研究的發展與思考，《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
- 劉 璐 2019 《網絡流行語的表徵心態研究（2004-2018）》，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劉文字、李 珂 2017 基於批評性話語分析的網絡語言暴力研究框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 （美）羅伯特·V.庫茲奈特（著），葉韋明（譯）2016 《如何研究網絡人群和社區：網絡民族誌方法實踐指導》，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馬若宏、杜 敏 2021 近十年國內新媒體語言研究的視覺化分析，《今傳媒》第 9 期。
- 繆素琴、祝爾悅 2022 網絡聊天英語的博弈論解讀——以 Messenger 聊天為例，《外國語言文學》第 1 期。
- 宋作艷 2019 從百度指數看新詞語的熱度變化，《語言學論叢》第 1 期。
- 孫 琳 2014 現象學方法與辯證法——兩種方法論對比，《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 汪 磊 2016 網絡語言研究十年，《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
- 汪 磊 2022 主持人語 線上語言生活：現實與虛擬的雙維轉向，《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
- 王亞泉 2015 《網絡語言交際符號與消費者情感及購買意願的相關性研究》，華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王炎龍、朱述才 2009 網絡語言傳播的多元論與進化觀，《新聞界》第 2 期。
- 王宇波 2011 《基於網絡媒體監測語料庫（漢語）的性別語言差異實證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沃 野 1997 論現象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學術研究》第 8 期。
- 徐 杰、覃業位 2015 “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當代修辭學》第 4 期。
- 楊則正 1996 《Keep Smiley》或新的網絡語言，《管理科學文摘》第 11 期。
- 張佳奇 2021 《互聯網語境下的群域話語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趙 猛 2020 語言的現象學分析：以胡塞爾的《邏輯研究》為例，《學衡》第 1 期。
- 鄭婷婷 2017 《政務微博意見領袖話語特徵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鄒春燕 2015 《生態語言學視域下的漢語網絡流行語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Baron, Naomi S. 1984.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s a force in language change. *Visible Language*, 18(2): 118-141.
- Bolander, Brook & Locher, Miriam A. 2014. Doing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on computer-mediated data: A review of four methodological issues.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3: 14-26.



- Crystal, David. 2001.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2011. *Internet Linguistics: A Student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 Dahlberg, Lincoln. 2004. Internet Research Tracings: Towards Non-Reductionist Methodolog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9(3).
- Glaser, Barney G. & Strauss, Anselm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5-12; 88-103.
- González, Rafael Alejo. 2003. Reseña de “Netlinguistic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tudy Language,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Internet” de Santiago Posteguillo. *Ibérica*, (6): 162-165.
- Hulstijn, Jan. 2020. Proximate and Ultimate Explanation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utch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9(1): 21-37.
- Jeong, Allan. 2005. A Guide to Analyzing Message-Response Sequences and Group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26(3): 367-383.
- Larsen-Freeman, Diane. 1997.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8(2): 141-165.
- Larsen-Freeman, Diane. 2010. The Dynamic Co-adaptation of Cognitive and Social Views: A Complexity Theory Perspective. In Batstone, R. (Ed.).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0-53.
- Lister, Martin, et al. 2009.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Parikka, Jussi. 2012.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37-38.
- Pettigrew, Simone F. 2000. Ethnography and Grounded Theory: A Happy Marriage?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7: 256-260.
- Rymes, Betsy & Leone, Andrea R. 2014. Citizen Sociolinguistics: A New Media Methodology for Understanding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29(2): 25-43.
- Thomsen, Steven R., et al. 1998.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 Exploring the Cyber Streets. *Information Research*, 4(1): 1-17.

程潤峰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 新媒體語言文化傳播研究中心 572520060@qq.com

謝曉明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 新媒體語言文化傳播研究中心 13554183399@163.com